

容 闳 与 上 海

苏 智 良

容闳(1828—1912年)是中国近代史上不可忽略的一位重要人物。他是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先驱,又是期待并致力于祖国进步富强、跟上世界潮流的真正的爱国者;他是一个充满热忱而不谋私利的社会活动家,又是中国近代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;同时,他还是“教育救国论”思想的早期阐发者,以及绵延至今的中国留学运动的缔造者。

在容闳84年的一生中,有一半时间是在美国度过的。上海则是容闳在国内生活时间最长的地方,前后计达10多年,其中有青年、中年时期,也有老年时期。他的主张从实业救国到教育救国,由变法维新到反清革命,在上海留下了闪烁思想者光彩的印迹与卓越之贡献。

—

1856年8月,容闳因在香港审判厅受外人排挤辞职而乘坐 Florence 运茶船前往上海,从此与上海这个因开放与商业发展而变得日益重要的城市,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
容闳到上海后,即入江海关翻译处为通事,月薪银75两。这个工作较为轻松,生活也十分安定,但容闳不久便发现海关与外商“咸通声气,狼狽为奸,以图中饱”^①,对贪污贿赂与外国人之霸道十分痛恨。他说:“自外人辟租界于上海以来,侵夺我治外法权,凡寄居租界之中国人,处外人势力范围之内,受彼族之凌侮,时有听闻。”一日,容闳有意询问税务司李泰国(Lay, George Tradescant)说:“予以在海关中奉职,将来希望若何?亦能升至总税务司之地位乎?”^②李泰国即作出否定的回答:“凡中国人为翻译者,无论何人,绝不能有此希望。”容闳听罢立即递上辞职书,李泰国以为容闳是对薪水不满,立即表示月薪银增至200两,希望慰留。容闳回答道:“中国人并不是以金钱为生命的”,他是看不惯海

关与商人勾结,徇私舞弊,遂拂袖而去。

1857年初春,容闳进入英国商人开设的洋行从事丝茶贸易。该公司倒闭后,容闳成了失业者,遂以代人翻译维生。时有一著名外国洋行大班逝世,上海商界招聘人才将悼词译为英文,容闳也去跃跃一试,他与英国领事的英国秘书(其兄为《中国内乱记》的作者)同时翻译此文,最后人们公认容闳的英文贴切流畅,远胜于英国人,容闳的译文被勒之碑石,一时传为美谈。

容闳对西方殖民者之骄横极为愤怒。一次,有个高大的苏格兰人把一团棉花球粘在容闳的辫子上以示嘲弄。当小个子的容闳要求他立即拿掉时,这个骄蛮的苏格兰人竟出手打了容闳一个耳光,容闳秀才发怒,立即重拳还击,将对手击倒,血流满面,最后狼狽而逃。这在洋人高人一等的租界是罕见的事

① 容闳:《西学东渐记》(徐凤石等译)。以下未注明出处者,均引自该书。

② 容闳在《西学东渐记》中称李泰国为总税务司,查李时应为税务司,到1859年才升任总税务司(见《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》,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,第278页)。

情,上海市民把容闳看作为英雄。容闳对底层民众则极富同情心。1858年黄河水灾,百姓流离失所,饥寒交迫,时任洋行书记的容闳代表上海的绅商募集了2万银元。经过这些事情,容闳已经成为上海社交界无人不晓的名人了。容闳与当时的学人曾学时、李善兰、徐寿、王韬、张斯桂和徐润等交往颇密。如徐寿(1818—1885年,字习村,江苏无锡人,为著名科学家),曾创办格致书院,容闳与他交往颇多;张文虎(1808—1885年,字孟彪,上海周浦人,后为曾国藩的幕僚),与容闳也是好友。容闳前往美国购买机器时,张文虎作诗道:“世运需材急,良工利器先;乘槎非凿空,向若愧张骞。”对容闳寄以莫大的希望。后来容闳再赴美国,张又赠诗期待容闳有更大的作为:“国计大可忧,君乃独奋然”;“酌酒以赠君,去斩长黄虬”。^①

时有宝顺洋行大班仰慕容闳之才华,请他出任该公司长崎分公司的买办,容闳婉拒,并说:“买办之俸虽优,然操业近卑鄙……买办之身份,不过洋行中奴隶之首领耳。”但为了生活,容闳后来还是答应在该行担任书记。1859年3月,容闳受遣到苏州、杭州、南昌、湘潭等地调查茶叶、丝绸的生产情况。他对祖国之壮丽河山十分赞叹,对农村的贫瘠、荒凉印象深刻,他考虑如何开发资源,发展经济,同时针对外国列强“以强权蚕食我边疆,扩充其势力”,他大声疾呼“若不急谋防范,则涓涓不塞,将成江河”,国家形势将更加危险。所到之处,兵火之余,满目疮痍,容闳感到不能再坐视下去了。

这时,太平天国运动蓬勃兴起,却遭到外国列强和清朝的联合镇压,当太平军进攻上海之际,驻扎上海的英、美、法军队严密防范,甚至悍然开炮阻击。容闳对此表示强烈的不满,主张应该由中国“完全行使其主权”,让中国人自己解决问题。1860年11月6日,不满清朝腐败无能的容闳邀外国传教士一起离沪赴宁,向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提出了中国

最早的资本主义改革方案,旋因对天国后期领导层的腐败、低效而失望,而于1861年1月上旬返沪。此后,他来往于上海与九江之间,进行茶叶贸易达3年,并在经济上获得了很大的成功。但他的理想不是当个成功的商人,而是热心倡导发展民族工商业,以促进祖国的进步。

1863年秋,容闳经数学家李善兰和张斯桂等的介绍,去安庆拜见曾国藩,游说其采纳他的维新方案。容闳首先要求设立“制器之厂”,他指出:“中国今日欲建设机器厂,必以先立普通基础为主,不宜专以供特别之应用。所谓立普通基础者,无他,即由此厂可造出种种分厂,更由分厂以专造各种特别之机械。简言之,即此厂当有制造机器之机器,以立一切制造厂之基础也。”这一主张与曾国藩不谋而合,曾氏决定设立上海江南制造局,从此容闳参与洋务事业20年。10月容闳回到上海后,携款6.8万两为筹建上海江南制造局前往美国采购机器。他先在上海结识美国机械工程师哈斯(Haskins),请他协力。1865年春容闳从美国朴得南公司购入百余台机器,这是中国近代第一次大规模地引进外国机器设备。江南制造局由虹口沿黄浦江处(今九龍路溧阳路一带)迁至高昌庙,并逐渐扩大,成为中国乃至东亚最先进最齐全的机器工厂。1867年曾国藩到上海视察,容闳提出在江南制造总局旁设立兵工学校的建议,以培养中国自己的机械工程师。此议立即得到曾国藩的赞许,不久,学校成立,第二年,又设立了翻译馆。容闳因创办江南制造总局有功而升为五品,以候补同知之资格在江苏省巡抚署为译员,与上海道台丁日昌结为知己朋友,后来还随丁日昌去扬州生活了半年。1878年,容闳捐款13133元英洋,购买了一批美国制造的枪炮弹药^②。容闳还支持并协助郑观应创办了

① 张文虎:《舒艺室诗存》卷六。

② 袁鸿林:《容闳论述》,《近代史研究》1983年第3期。

中国第一家棉纺工厂——上海机器织布局。

在上海期间,容闳还参与了一些文化活动,通过翻译西方著述和办报纸,来开展资产阶级启蒙文化活动。他利用业余时间翻译了帕森(Parson)的《契约论》和一本英国法律,还翻译了科耳顿(Cotton)的《地理学》。他认为这些知识对中国人民是迫切需要的。

1874年6月16日,容闳协助上海知县叶廷眷、怡和洋行买办唐廷枢等创办了《汇报》(英文名为《News Collector》)。容闳等请英人葛理(Grey)担任名义的总主笔,实际则由他和所聘的黄子韩、贾季良、管才叔和朱莲生等负责,容闳不仅“倡立馆规”,而且还亲自承办机器。《汇报》是近代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份报纸。9月,《汇报》易名为《彙报》,稍后又更名为《益报》,不久即告停刊。《汇报》存在的时间虽不久,但它作为近代汉语报刊之一种,仍具有重要历史意义。在西方列强侵华、民族矛盾日益尖锐的时刻,容闳主办的《汇报》站在中国人民一边,旗帜鲜明地谴责侵略者的行为。该报指出:“本局为中华日报,自宜求有益于华之事而言之,故于有裨于中国者,无不直陈,而不必为西人讳。”^①当英国人欲侵犯中国主权、擅自在上海修建吴淞铁路时,《汇报》又明确表示反对,并与英国在上海的舆论喉舌《字林西报》和《申报》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。《汇报》还极力鼓吹向西方文化学习,以求尽快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。后由于财力不济和销路不畅,在出版了一年半后,于1875年12月4日停刊。

二

60年代,容闳在沪的一个重要活动是发起出洋留学运动。经过长期的西方近代教育的熏陶,他的一个夙愿是教育救国。他认为以美国人蒲安臣为中国的首席代表与外国签约是中国的耻辱,中国应该培养自己的外交家。在当时的形势之下,中国要摆脱列强的欺压,发展国力,唯有培养大批近代化和改革

的人才,教育救国,“舍此计划,实无救亡之良策”。这一计划酝酿已久,早在美国留学期间,容闳“已预计将来应行之事,规划大略于胸中”。他向太平天国提出的7条建议中,有4条涉及教育。1868年他即向升任江苏巡抚的丁日昌提出留学的计划,得到了丁的“大赞许”,容闳立即向清政府提出“条陈四则”。这四则中,一、三、四则不过是陪衬,“眼光所注而望其必成者,自在第二条”。这就是容闳的留学计划:“政府宜选派颖秀青年,送之出洋留学,以为国家储蓄人材。派遣之法,初次可先定一百二十名学额以试行之。”此外,他还对留学生的要求、管理、教育、经费等等都作了周密的可行性设计。他提倡教学民主,独立思考,“籍西方文明之学术”,达到“维新中国之目的”。他把这一计划的实施看作是“中国二千年历史中,特开新纪元”。

很可惜,容闳的留学计划又被搁置了3年,1870年天津教案发生,容闳随曾国藩、丁日昌去北方处理善后,遂又向曾国藩进言,得到了他的同意,曾与李鸿章等人的鼎力协助,清政府同意拨120万两银子、以20年为期,选派幼童出国留学。1871年9月3日,容闳代曾国藩起草了著名的《挑选幼童赴泰西肄业章程》,对选派幼童出国留学的条件、出国后的待遇、守则等作了规定。接着,清政府按照容闳的设想,首先在沪设立预备学校——幼童出洋肄业局。1871年夏,容闳在上海开始招生,学生学习中、英文,每半年考试一次,合格者送往美国。1872年8月11日,第一批学生詹天佑等30人前往美国留学。前后有共4批120名官费学生留美。为安排留学生,容闳先到美国筹划建立中国留学事务所,容闳以三品衔出任正监督。但由于受到保守势力的疯狂攻击,这些学生终于在1881年被全部撤回,容闳的教育救国理想再度破灭。尽管如此,容闳以他的爱国热情和百折不挠

^① 《译辨字林报》,《汇报》1874年8月25日。

的努力,开拓了中国大规模留学以向西方学习的事业。

三

教育救国理想的破灭,给容闳以很大的刺激。他说:“1880年至1886年,为余生最不幸时期。”1882年容闳曾回到上海居住,4个月后因夫人在美国重病而再度赴美。但甲午战起后,容闳意识到“中国根本上之改革”,已是“不容稍缓之事”。遂又从沮丧中振作起来,于1895年初夏回到上海,即向两江总督张之洞提出了改革行政的方案,然而张之洞却以为这些“新政策”过于激进,而不予采纳,只是给容闳一个“江南交涉委员”的虚衔。不久,张之洞返任湖广总督,刘坤一继任两江总督,刘氏更无心维新。容闳又辞职了,理由是每月只领饷,而无一事可为。接着他来到上海开办事务所,以自谋生路,并立誓不再担任清政府的任何官职。

甲午战后的中国,民族危机日益加深,知识分子汇集、新思潮激荡的上海,也在酝酿爱国维新运动。1896年,容闳先后结识了梁启超和康有为^①,梁启超等对这位前辈十分敬重,称他“学问最优”^②。容闳对是年在上海问世的中国资产阶级的重要报刊《强学报》、《时务报》也表示赞许。在康、梁的支持下,容闳向政府建议创办国家银行、铁路公司等,他写成《请创办银行章程》,计总行章程12条,分行章程24条。他提出:“先设总银行于京都,续设分银行于各省城及通商口岸。总银行资本以一千万元为额,统由户部筹拨,钦派大臣督办,并专派大员总办;分银行即由督办、总办陆续招商集股,择地开设”^③,并铸造硬币,印发纸币。接着他又写成《续拟银行章程》,在薪水、房屋、事权等方面作了认真的可行性研究^④。此事获得总理衙门的同意而开始操办,但旋因盛宣怀的破坏而夭折。

1897年秋,容闳又满怀激情地完成了《铁路条陈》,提出大力修建铁路,具体计划是

借助美国“商人之财力而权自我操”,“变通办理,纠合公司,订定章程,所有畿东、滇南、川广、芦汉、苏杭、淞沪等处,同时并筑,并建双轨。阔以四尺八寸半为度。如有华商愿出资本,并归公司合办。边境之瘠,内地之肥,获利多寡,通盘合作,不出五年,一律筑成”。“查铁路初兴,需才甚众,不得不聘用洋人。惟将来路须归官,生手如何接办,必须预先造就。应由公司于通商大埠,另设铁路学堂,专选聪颖子弟,教以筑路行车,并熔炼钢铁等法,日后人才辈出,即可自行管理”^⑤。其方法是比较可行的。

但这一主张因德国的反对而再遭否定,容闳认为失败的主因是“中国行政部门的彻头彻尾的腐败。上至慈禧太后,下至一般最小的官吏,整个帝国的政治组织都充斥着贪污受贿。”此后的容闳便积极投身于变法维新的事业。

四

戊戌维新之时,容闳前往北京,他认为光绪皇帝“聪明睿智,洞悉治理,实为中国自古迄今未有之贤王”。因此,他积极参与了变法的实践,与翁同龢、张荫桓及康、梁等来往密切。光绪皇帝所颁布的维新法令中,不少是出自容闳策划和他的手笔。容闳的金顶庙住所“一时几变为维新党领袖之会议场。”戊戌政变后,京城笼罩着白色恐怖,容闳因有美国国籍仍继续活动。容闳曾请李提摩太设法营救梁启超。后体仁阁大学士徐桐上折参劾维新领袖,控告容闳“行动诡密”^⑥。于是,容闳

① 杨复礼:《梁启超年谱》,《戊戌变法》第4册,第172页。

② 梁启超:《戊戌政变记》,《戊戌变法》第1册,第285页。

③ 容闳:《请创办银行章程》,《时务报》,第九册,光绪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一日。

④⑤ 容闳:《续拟银行章程》、《铁路条陈》,《时务报》第十册,光绪二十二年十月初一日。

⑥ 转引戴学稷、徐如:《维新前后的容闳及其与康有为、梁启超的关系》,载《论戊戌维新运动及康有为、梁启超》,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,第395页。

也不得不退至上海,托庇于租界,利用这个特殊地域以作基地。

维新事业的失败,使容闳沉浸在一种痛苦之中,但不久他的思想又有了新的飞跃。他逐渐认识到要改变中国落后的现状,就必须推翻清政府的统治,在古稀之年,他又从维新派的左翼上升为革命派。1899年他到香港逗留,其堂弟、留美幼童之一的容星桥(又名容耀恒)是兴中会会员,并且也在香港活动。于是容闳通过他结识了一批主张反清革命的兴中会会员,并且与孙中山相识,孙中山对容闳这位留洋前辈十分尊重与敬慕,希望推举他出来担任各进步团体的领袖。孙中山说:“在中国政治改革派的力量中,尽管分成多派,但我相信今天由于历史的进展和一些感情因素,照理不致争执不休,而可设法将各派,较好地联成一体。作为众望所归的领袖,当推容闳。”^①

容闳于1900年春回到上海。时唐才常领导部分兴中会成员在沪成立正气会——自立会系统,这一系统成为上海改革力量的中坚,容闳作为“孙中山之代表”与之会谈,唐才常等遂决定“一面接受康、梁领导,一面又遥戴中山先生”^②,并决定建立国会,以“号召国人奋起自救以救中国”^③。容闳与唐才常、严复、马相伯多方交谈磋商。经过短期的接洽,是年农历六月(1900年6月27日至7月25日)容闳与唐才常召集一批激进的仁人志士在张园集会,有严复、章太炎、沈荇、马相伯、龙泽厚、林锡圭、叶瀚等人出席,讨论中国之前途,容闳被推选为临时议长,并明确准备正式以中国议会之名义活动。7月26日(农历七月初一),容闳等80余人在愚园南新厅集会,会议由叶瀚主持,到会人投票选举议长,容闳以42票当选为议长,并定名为中国议会,国会议员有唐才常、章太炎、文廷式、吴葆初、叶浩吾、宗恕、张通典、沈荇、马相伯、龙泽厚、毕永年、林圭、狄葆贤等。时“容公向大众宣讲宗旨”,宣布不承认“通匪矫诏”之清政

府,力争“保全中国自主”、“联外交”、“平内乱”等,“声如洪钟,在会人意气奋发,鼓掌雷动”^④。这是一次具有资产阶级民主色彩的投票选举。因其首次会议在张园举行,故又称作“张园国会”。

7月29日(农历七月初四),容闳又主持了中国议会在愚园的集会,计有60多人出席,容闳任命唐才常为会计,叶瀚等负责书记,郑观应、唐才常、汪康年等为干事^⑤。当时容闳与唐才常等商议,如果举事成功,即以中国议会作为将来组织政府之基础。唐才常当时就说:“上海国会或议会设立之意图,欲俟起事成功,即暂以此会为议政之基础。自立会同,除争取民主权利与政治革新而外,制度如何树立,政府如何组织,均待选举程式确定,正式议会成立,合全国人民,五族共议,协商处理,期于至善。”^⑥容闳还为自立会起草了英文对外宣言,据与会的唐才常回忆,宣言首先否认清廷具有统治中国的权利,“次言将欲更始,以谋人民之乐利,以伸张乐利于全世界,端在树立二十世纪最文明之政治模范,以立宪自由之政治权与之人民。”^⑦史学家周锡瑞在英国档案馆中找到了这份宣言,“‘它的基本纲领是英国政府的不成文宪法里的大宪章’,……议会决定:我们的坚定是:对现时复杂问题的最简单的解决方法,是联合列强、

- ① 转引顾长声:《容闳——向西方学习的先驱》,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,第70页。
- ② 吴良槐:《自立会追忆记》,转引《梁启超年谱长编》,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,第243页。
- ③ 唐才质:《唐才常烈士年谱》,载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编:《唐才常集》,中华书局1980年版,第277页。
- ④ 孙宝焯:《日益斋日记》,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一日。中国近代史料丛刊《戊戌变法》第1册,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,第540页;《汉口自立报宣言》(中译),《中外日报》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十四日。
- ⑤ 孙宝焯:《日益斋日记》(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一日)。《戊戌变法》第1册,第540页。
- ⑥⑦ 唐才质:《唐才常烈士年谱》,载《唐才常集》,中华书局1980年版,第277页。这一宣言后被清朝官员抄获,并翻译成中文。

废黜慈禧太后及其老朽顽固派和反对派同僚，恢复维新改良代表人物光绪皇帝的权力。”^①中国国会推容闳负责外交事务，容闳也曾设法争取英国对他们活动的支持，并游说张之洞“联合长江各省”，“成立中国独立政府”，但并无实效。

中国国会成立后，在上海设立总部，在汉口设立分部。各地的自立军自然由中国国会领导，称“中国国会自立军”，并拟分7路大军举行起义。8月21日，唐才常发动汉口起义失败，中国议会的315名成员被通缉追捕。面对残酷的现实，容闳深感悲痛，他彻底地放弃了走上层路线维新的幻想，而开始主张反清暴力革命，并以他的不断进步和百折不挠的精神而享有崇高的威望。1900年革命党人谢瓚泰曾向孙中山建议：以容闳为“统一维新党的总统”^②。接着革命党人洪全福、李纪堂等准备在广东举行反清起义，拟推容闳为未来共和国之大总统。容闳因参与反清活动而被清廷定为“谋乱之头目”，应予以“就地正法。”^③于是，人们劝容闳上海租界亦非乐土，1900年9月1日，容闳化名“泰西”被迫离开上海，在驶往日本的轮船上，容闳巧遇孙中

山，经过推心置腹的交谈，容闳认为孙中山“其人宽广诚明，有大志”，便以“华盛顿、弗兰克林之心志”勉励之。在日本横滨，容闳与孙中山等曾彻夜密谈^④。容闳自己也更加支持革命事业。此后容闳在香港作短暂生活后去美国定居，再也未能回上海。

容闳的一生顺乎历史潮流而不断进步，为祖国、为民族之振兴而不息奋斗，贡献心智，尤其对中国近代化与开放观念之进步，贡献实多，其在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地位，应予以充分肯定。他是中国近代先进知识分子的一个缩影。为了纪念这位教育救国的思想家和实践者、中国近代先进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在上海的卓越活动，上海交通大学在1933年建立容闳堂，这幢大楼至今仍矗立在交大校园里。

（作者：苏智良，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；
责任编辑：谢宝耿）

① 周锡瑞著、杨慎之译：《改良与革命——辛亥革命在两湖》，中华书局1982年版，第30页。

② 冯自由：《革命逸史》第3册，第46页。

③ 光绪朝《东华录》（四），总4574页。

④ 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：《支那·革命党关系》卷一，卷二。

（上接第57页）

为一谈。笼统地把中国古代天文学称为“天文星占之学”，实际上是不合适的。荀子论天与王充论天是不同的，张衡说天与郝萌说天有很大的差别，邹衍谈天与董仲舒谈天也不一样。天文学早期与占星术纠缠在一起，是世界各国共同的现象。地心说不是也在第九层天上安排了上帝的居处吗？可见，天文学与占星术混合在一起，并不是中国古代天文学的特殊现象。

中国重综合，是优点，也是缺点。现在需要的是引进西方的分析方法，来补中国缺乏细致分析的不足。重综合，造成模糊不清，量化不准，以及许多弊端，都需要加强分析，才能得以克服。重视分析，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，是科学发展的重要条件。

中国传统的科学思想与西方的科学思想有互补的关系。中国重整体综合，西方重局部分析；中国有较多的辩证思维，西方有较多的定量研究；中国重实用价值，西方重理论体系；中国重继承维护，西方重革新发展；中国医学以活体功能为基础，西医以尸体解剖为基础；中国医学以草药为主，西医以化学药品为主。中西方的科学思想各有长处，互相结合，更有利于科学的发展，也将是世界科学发展的新趋势。模糊数学、测不准原理、系统论、全息论，这些最新的科学进展都包含中国传统科学思想的某些成分，这就已经预示着今后世界科学发展的趋势。

（作者：周桂钊，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；责任编辑：第一）